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 上海报纸副刊文化生态研究

陈捷

**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由于受到营业化思潮的影响,副刊整体在思想趣味和文化品格上呈现出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时事新报》副刊《报余丛载》就是在这种历史生态和演变逻辑的影响下首倡黑幕文化。黑幕文化的恶性发展在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进步读者乃至北洋政府的普遍批判和制裁。《时事新报》为了挽回危局,在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的带领下,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文化副刊——《学灯》,裁撤了以黑幕文化为特色的《报余丛载》。这不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壮大,已经渗透到了报纸文艺副刊,而且也反映出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潮流下应时而变的积极态度。

**关键词** 文艺副刊 社会新闻栏 访员制度 黑幕文化 《时事新报·学灯》

陈捷,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 210094

中国的报纸之有副刊,人们一般认为最早是1897年11月24日随报附送的上海英商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sup>[1]</sup>。从这个阶段起,一直到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最初其作用主要是在正张缺乏稿件时来补充版面,所以在当时就被老百姓称为“报屁股”、“报尾巴”,一般报纸也大多称其附张为“杂俎”、“徐兴”(或“余兴”)。因此,长久以来报纸副刊在报馆自身的文化角色定位中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报馆方面却发现这些不起眼的“报屁股”受到了日益崛起的知识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欢迎,它的娱乐性、针对性、即时性都是吸引普罗大众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报馆来说发展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就变成了扩大经营的极好手段。张静庐就指出:“副刊如编辑得法,辅助报纸的销行之力甚大,因容易受一般青年学子所欢迎,往往为了一份副刊而订阅一份报纸,这事情是很多的。”<sup>[2]</sup>至于为什么副刊会比正张更受到大家的欢迎,还与当时报纸正张千篇一律的编辑惯例、因循守旧的编辑作风有关。张静庐曾指出:“至于上海的报馆,则向来只知道剪裁外埠的报纸,或新闻社同性质的新闻的供给,除了外埠的特约通信员之外,更无所谓外勤记者。所以如果你细心的把各种报纸比较着看,往往使你惊异地发觉他们大同小异,有时竟至完全相同!本埠的新闻,采用新

[1]《字林沪报》创刊于1883年。

[2]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64页。

闻社和访员的,外埠的新闻,剪裁外埠的报纸,这几乎是各报馆所一成不变的新闻编辑法!”<sup>[1]</sup>正是由于报纸正张大家都大同小异,于是利用副刊的差异性来相互竞争以扩大经营就成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必然。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sup>[2]</sup>可见,当时报纸的官化和营业化是民国早年两种不良的倾向。姚公鹤曾说,“俨藉报纸为党争之利器,则愈演愈进,愈况愈下,举全埠(指上海,笔者注)报纸而能脱离此漩涡者,已不数数见矣。……有鉴于中国之党争,凡著名之报无一不落党阱。”<sup>[3]</sup>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以往政党色彩鲜明的上海报业转而出现了一股政治色彩褪色、“营业化”色彩激增的潮流。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到《时事新报》时说:“初为研究系所经营之机关报,后乃竭力设法脱离窠臼,改为营业性质”;在谈到《中华新报》时也说其“为政学系之机关,近亦注意于营业”;在谈到《新申报》时又说:“其出版之初,乃与申报之纠葛有关系,后略渗入临时的政治性质,势力当然与申报相差远甚,但现在在竭力改进中,颇注意于营业。”谢六逸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时代,新闻受了经济势力的影响,它脱离政治羁绊,变成一种产业,这是当然的发展。”<sup>[4]</sup>但是,在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报界对营业化过度追求的倾向导致了副刊整体精神层次和思想水准的堕落。报纸的营业化本来是正常的,不但可以摆脱沦为“拿津贴”、政党团体附庸的先例,而且可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进而扩充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就是在这样一股为了注重经济效益而转为“营业化”的时代文化风潮中,报界经营者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反而“为营业所化”。于是,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买办文化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畸形交织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追逐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增加报纸的经济收入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就成了许多报社老板和副刊编辑者所信守的教条、圭臬。京沪各地报纸普遍出现了因为过度注重营业化而导致的“大报小报化”之倾向。

在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下,报纸副刊生态变得异常恶劣。新闻史家张静庐在回顾当年的历史状况时曾说:“从前无论京沪和各地的新闻纸,其报尾所登的小品文字,上海人所谓的‘报屁股’,都是登些红男绿女的小说和笔记,甚至于引人入胜的鬼怪神话,和诱人作恶的黑幕秘诀。”<sup>[5]</sup>在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中,中国早期新闻学学者徐宝璜也指出了中国报纸副刊界的“非道德化”倾向,他说:“吾国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副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寮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sup>[6]</sup>不光是报纸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甚至有敏锐的读者也注意到了副刊整体精神层面的堕落,“至若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谈,揣其用意,亦无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衡量计哉?”<sup>[7]</sup>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显然更是认识到了新闻界的堕落和这种现象的必然联系。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抨击了北京副刊界因为逢迎读者的低级

[1][5]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32页,第32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3]参见方汉奇、王润泽主编:《民国新闻史料汇编(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初版,第180页。

[4]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8页。

[6]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7]王璋:《为今日报界进一言》(自日本来稿),《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年5月。

趣味而呈现出“非道德”的现状,他说:“我所说的新闻界没有道德,一件就是‘逢社会之恶’。他国的新闻界是开导社会的,我国新闻界是逢迎社会的,真真可叹!近来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也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学好,新闻记者就绝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就去搜辑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微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忘。这番话不是我言之过甚,乃是实在有的。两年以来,更发达了北京的报纸,除了小报几十种不计外,其余大报之后,也纷纷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sup>[1]</sup>1919年10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蔡元培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及新闻界、副刊界的病态,“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海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sup>[2]</sup>蔡元培看法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当时报纸正张与副刊之间在文化境界、道德水准上的差异与错位。

上述几则材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与进步学者从新闻从业人员在拜金观念影响下道德的堕落、精神的萎缩方面入手,为当时的报纸所开列的病状。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决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幼稚的新闻界的组织人事体制、运作体制和新闻栏编辑习惯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要负相当的责任。同时,报纸正张的社会新闻栏对副刊品格的堕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当时国内的新闻界在副刊上自毁品格、贻害社会固然不错,但是他认为“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的说法显然也值得商榷。副刊整体的堕落,甚至所谓“黑幕文化”之起源与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腐朽及其对报纸副刊的渗透紧密相关。

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一书中谈到了当时上海报馆的组织结构,他把记者分为内勤记者和外勤记者,其中内勤记者又分为总主笔、总编辑、电信编辑、外省新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本地新闻编辑、社会新闻编辑、教育新闻编辑、文艺编辑、游艺编辑、商业经济编辑等11种。他在社会新闻编辑一栏下所作解释如下:“社会新闻编辑——所谓社会新闻者,是专记盗贼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琐事,以示区别于国际政治新闻而言。社会新闻名称是否确当,固尚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名词差不多已为一般人所惯用,且别无相当替代的名词,故此处仍称之为‘社会新闻’。我国报纸之注重社会新闻者,以北京的社会日报为首创,其后北京各报相继仿行,其新闻的来源,得诸侦缉队公安局者有之,得诸临时新闻记者(详见外勤记者与访员节)的投稿者有之。……上海首先注重这类新闻者为时报,现在则各大报均开辟专栏刊载,而时事新报尤为偏重,较之北京各报,可说是‘青出于蓝’了。”<sup>[3]</sup>至于社会新闻栏内的主要内容,谢六逸在1929年5月26日第8卷22期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上海各报社会栏记者养成所学则》一文中将上海报纸的社会新闻栏进行归纳,调侃式地将其分为强奸式、虫豸入女尸式、怪胎式、捕盗式、婚礼式、学者归国式、死尸展览,此为“必修科目”,另有枪毙罪犯式、学校始业休業式、主仆私奔式为“选修科目”。从以上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新闻栏的自身定位、编辑方法、写作风格和内容分类等方面的特色。

而这种出现在社会新闻栏中的丑恶现象与上海报馆流行的访员制度有很大关系。对此深有感触的张静庐指出:“……在上海,外勤记者与访员,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工作,可说是绝不相同。外勤记者是受雇于一报馆或一新闻社,而尽力所及去采访各种新闻,新闻所从发生的区域和机关,是有限定的,新闻的性质也是非常庞杂,不能规定的,而访员则不然,访员是占据了一个机关或一区地域,在这一机关(例如租界的临时法院)和一区域(例如闸北或南市)内,一日间所发生的新闻,全由该访员自行记述,分钞若干份,送给各报馆,而取得各报馆的稿费。……其所记述的新闻,则大都属于火警盗贼奸拐等事,而记述的方法,又刻板不移,文辞似通非通,事实囫圇吞枣,不

[1]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

[2]蔡元培:《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开会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28号,1919年10月16日。

[3]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82-83页。

求甚解,更谈不到记载的详尽确实,而报馆的编辑者又往往因为足不出户的关系,对于社会上一切鬼魅魍魉的黑幕,世态人情的变化,茫然不知,所以在访员们所供给的新闻里,最多只略略地加以审阅或修饰,甚至一字不易地便编入各版的新闻内。于是时常在报端发现不情不实的新闻,似是而非的新闻,欺骗大多数的读者。在混过一时间之后,社会上多数的读者,对此种颠倒错乱的新闻,渐感不信任,遂不得不于未读报纸之前,先在心里存了一种成见,就是读某种新闻要用某种方法,而后始不受报纸的欺骗。这将使报纸的信用丧失到何种程度啊!……访员之得在上海盘踞一地域与一机关而包办新闻,这差不多已是上海自有新闻纸以来之积习,什么人都不能把这种恶势力打倒。”<sup>[1]</sup>“当时(作者注:指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于新闻的采访,选择,都没有十分的用力,因此造成了封建式的访员制度,竟为新闻纸改革的一个大障碍。”<sup>[2]</sup>张静庐从社会新闻栏从业者的组织构成、行为作风和职业特色出发来分析访员制度的历史源流与影响,对我们在人事组织方面去理解那个时代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之堕落有着重要的帮助。

正是由于以访员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新闻栏胡编乱造,根本上背离了新闻最基本的要素——真实,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报纸社会功用极为看重的梁启超对这一“公器”的变质极为痛心。1917年1月12日,梁启超在北京安庆会馆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对报界之演说》,其中批判了中国新闻纸的虚假和捏造之风,他说:“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物物,无不影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恍惚,不可辨别,无以名之。……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海市蜃楼,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sup>[3]</sup>

那么,为何报纸社会新闻栏会发生此种转向而与以文化、艺术为特征的副刊发生关系呢?张静庐认为使用文学艺术手法来编辑社会新闻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如奸拐盗窃杀人自杀恋爱离婚等事,凡从前为报馆编辑所不注意者,亦即所谓访员所供给的死的刻板的琐闻,现在都用小说记事的方法,原原本本,详为记述委婉曲折,几与短篇的侦探或恋爱小说无异,为一般读者所欢迎。”<sup>[4]</sup>而张竞生在20年代初也提出对报界“美的新闻纸”的要求:“夫新闻纸所载社会纪事,与政治军事等,全在主笔有史才,把他做成有系统起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使社会枯燥的事情,一变而为极兴趣的材料。……今日新闻界常把至有趣的事情,用了一种极枯燥的‘电报式’写出来,仅使人觉得无味。例如死囚(常有极重要的人物在内)的记载,仅会抄官厅一纸通告了事。其在外国则将死囚在监生活及往刑场时状态及其心理,详细详细的登载出来,使人觉得津津有味。因为‘极刑’乃人生至重大的事而为社会之变态者,人人皆有注意之必要与喜看之趋向。”<sup>[5]</sup>在张竞生看来,这样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是“美的新闻纸”,是主编所谓“史才”的体现,于是才有把记载“社会之变态者”之新闻“做成有系统起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的必要,张静庐也指出当时的编辑作法“用小说记事的方法”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变态的需要而已<sup>[6]</sup>。鲁迅在三十年代评论阮玲玉之死而作《论“人言可畏”》一文,批评的虽然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报纸文化,可同样适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报纸生态。他说:“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

[1][2]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36-38页,第105页。

[3]梁启超:《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又见夏晓红辑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4]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83页。

[5]张竞生:《美的新闻纸》,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216页。

[6]有新闻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一般人的反帝国主义的注意,转而向他向。于是社会琐事,成为民众流行的谈话,民族意识就无形的消灭了”。参见樊仲云《中国新闻事业的危机》,李锦华、李仲诚《新闻言论集》,广州新启明印务有限公司1932年版,第315页。

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sup>[1]</sup>之所以在报纸上会有这样的文学描写,历来关注“国民性改造”的鲁迅认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小市民读者)化几个铜圆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很上算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报馆在营业化观念影响下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艺术化”倾向的历史逻辑,而报纸副刊将已经“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纳入其怀又是多么的理所当然!而社会新闻栏“艺术化”的恶性发展则直接导致了黑幕文化在报纸副刊栏内的流行。

## 二

黑幕文化、礼拜六派的产生与发展与报纸副刊在营业化追求的宗旨下的堕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黑幕文化则又进一步严重地干扰和损害了社会文化生态、报纸副刊的健全发展。而它的兴起和退潮都与《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密切相关。

罗家伦在写于1918年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说起黑幕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蘖。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东生在《封建势力在报纸上》一文中也指出,“然而最不通的是所谓社会新闻,上海的小报,因为专记载私人的隐事,或者造谣以敲竹杠,是给人认为下流无耻者之所为的,……大报的编辑,知道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有这样的效果;于是自时事新报作俑于前,其他报纸,亦俱先后抽出奸杀恋爱绑票的事件,加以动人的标题,名曰社会新闻。……但是这种小报化的现象,一般报馆的编辑,方自以为革新,那里知道这是报纸的堕落!”<sup>[2]</sup>

1916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在其当时的副刊《报馀丛载》(主持者为编辑钱生可)上开辟“上海黑幕”栏目,并且大肆征集所谓的黑幕材料。这在上海的报纸副刊界尚是首次!胡适在1918年创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认为这是“最下流”的做法,也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当时《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充斥着大量的所谓黑幕小说,社会上也流行着诸如《上海黑幕》、《中国黑幕大观》等黑幕作品,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乌烟瘴气、黑暗之极。

1918年3月1日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了路滨生编辑的《中国黑幕大观》正续集,鸳鸯蝴蝶派文人王钝根在该书的序言中极力褒扬黑幕,他说:“黑幕者,摘奸发覆之笔记也。某报社创之于先,各书肆继之于后。惟某报社之黑幕,纪事囿于一隅,而各书肆所出之黑幕,内容又未必尽佳。于是有路滨孙者,奋袂而起,手编中国黑幕大观四巨册,都百万言。自比燃犀铸鼎,奸魅无遁形矣。”<sup>[3]</sup>又说:“然则主人之辑为是书,不啻为黑暗社会建设无数灯塔,作奸者不敢尝试,涉世者知所趋避,百余万言之福音,有功于世道人心者甚大。黑幕既除,神州遂旦,古人不欺暗室之风,或者复见于今世乎!”<sup>[4]</sup>而事实上,这类黑幕书籍中大量充斥着色情、龌龊的变态描写和极端腐朽的思想倾向。叶楚傖直指黑幕文化之敛财真相,他说:“黑幕二字,今已成一海淫海盜之假名。当此二字初发见于某报时,小凤奉之若神明,以为得此慈悲广大教主,将地狱现状,一一揭布,必能令众生目骇心惊,见而自戒。及见其渐近于猥亵,则喟然叹曰:洪水之祸发于此矣。果也,响应者,春芽怒发,彼亦一黑幕,此亦一黑幕,……夫开男盜

[1]鲁迅:《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2]东生:《封建势力在报纸上》,转引自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6页。

[3][4]王钝根:《中国黑幕大观·序》,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第208页。

女娼之函授学堂,则直曰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耳;卖淫书则直曰卖淫书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sup>[1]</sup>

正在崛起的新文学界,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黑幕文化”对文学、社会的严重危害,旗帜鲜明地抵制这种不道德的游戏文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黑幕小说”与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说:“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sup>[2]</sup>周作人则先后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论“黑幕”》和《再论“黑幕”》,条分缕析地驳斥了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要求为黑幕正名的呼声,最后他断定:“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sup>[3]</sup>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就封建文人游戏文学的观念发表评论说:“……小说家本着他们‘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sup>[4]</sup>批判不可谓不尖锐。针对报界的乱象,就连跟《时事新报》关系紧密的梁启超也批评道:“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sup>[5]</sup>

甚至北洋政府方面也注意到了社会上流行的黑幕小说、奇情小说、浪史奇观等书籍、图画、报纸广告对新闻报纸和社会大众的精神危害。1916年10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发现北京城内流行猥亵图书书籍,呼吁教育部予以取缔,教育部请求内务部设法查禁猥亵图书书籍,以维持风气。当月内务部下令严行取缔该类书籍;同年11月,内务部又下令严禁奇情小说和浪史奇观之类书籍;同年12月,内务部再次下令劝诫各新闻报纸自律,以维护社会风气。1918年9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再次发出公开信,劝诫报界“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信中说:“(黑幕文字)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策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海淫之讥。此类之书,六部社会,将使儆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本吾国文学之价值,勿逞一时之兴会,勿贪微薄之盈利。”<sup>[6]</sup>我们知道,报纸、书籍出版与整个文化环境、文化生态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好的文化环境是需要各个组成部分的健康发展才可以实现的,否则,局部的癌细胞就可以染遍整个健康的肌体。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府高压、学界反对、社会侧目的现实环境下,《时事新报》面临多大的危机!1917年,已经厌倦了议会政治斗争的研究系学者张东荪接替北上的张君勱主持《时事新报》,严峻的形势逼迫他开始着手《时事新报》及其副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1918年3月4日在张东荪、潘公弼等人的主持下创刊了“五四”四大副刊之一《学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学术性副刊,其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不言而喻!民国报人袁昶超在《中国报业小史》中对《学灯》出现之意义评价很高,“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若干著名报纸已增加副刊,介绍新时代的新思潮,讨论新社会的新问题,比诸单纯讲求兴趣的资料,较有重大的价值,而副刊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时事新报已增‘学灯’副刊,目的在‘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始创于民国七年三月三日,初由张东荪主编,迨五四运动之后,‘学灯’由宗白华主编。……自此以后,副刊成为我国报纸的一种专栏,差不多没有一张报纸不设副刊,而其性质也有多种,俾适合各种读者的程度。除学术、文艺而外,还有教育、科学、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妇女、儿童

[1]转引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5页。

[3]仲密(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六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7号,1922年7月。

[5]夏晓红辑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6]转引自严家炎:《史余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4页。

与图画等副刊,含有颇浓厚的杂志色彩。”<sup>[1]</sup>又说:“时事新报又曾于七年三月四日发刊‘学灯’副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sup>[2]</sup>评价可谓极高。

台湾学者赖光临在《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曾说:“时事新报最大的革新,是在潘公弼主持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他提出‘全盘业务平衡发展’方案。开辟副刊《学灯》,和报端长评声求气应,增加声势。并着手改革新闻部门和附张。时事新报的附张称‘报馀’,曾刊登《上海的黑幕》,连续二三年,受社会注目。只是风格和长评不调和,因将‘报馀’改名为‘青光’<sup>[3]</sup>,标榜高尚的幽默。”<sup>[4]</sup>我们知道,一个副刊,就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舞台固然重要,他的舞伴更加重要。如果把《学灯》比作是一个演员的话,那么《时事新报》就是它的舞台,而他的舞伴就是《时事新报》的其他副刊。张东荪、潘公弼等人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舞台,来改造并组合演员”。文艺副刊到底能不能跟“报端长评声求气应”、是不是跟“长评相调和”、是不是“全盘平衡发展”,这才是当时时事新报馆主事者在栏目取舍、编辑改革等方面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显而易见,在生意和原则面前,时事新报馆是有自己长远考虑的。

我们知道,《学灯》是由以往的栏目“教育界”改造而来的。而在它诞生的同时,《时事新报》上还有其他的副刊存在,首倡黑幕的编辑钱生可负责的《报馀丛载》就是原本老牌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在《学灯》的第一期版面下,就出现了查禁海淫小说的政府公文,无疑时事新报社主事者已经觉察到了黑幕文化的日薄西山,《学灯》的出台就是他们逐渐想与黑幕决裂的第一步。而此时在黑幕首倡者钱生可主持的《报馀丛载》栏中,仍然大量充斥着粗制滥造的黑幕小说和格调低下的所谓文艺作品,比如“女学生之黑幕”、“巫医之黑幕”等。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黑幕文化的颓势已经是越来越鲜明的暴露出来,甚至钱生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18年11月9日,张东荪和潘公弼终于下定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当日《时事新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黑幕者,本报本其改良社会之宏愿特创之一种纪实文字也。两载以还,极承各界赞许,黑幕名词遂卓然成立。而最近各小书肆之投机出版物接踵并起,亦无不各有其黑幕。试就各报广告栏而一计之,不下百十种之多。以表面言,本报创之于前,各书肆继之于后,我道不孤,不可谓非极盛。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此类效颦之黑幕虽至多,试逐一按其内容,海淫者有之,攻人隐私者有之,罪恶昭著,人所共见。黑幕二字即其自身之评,尚何改良社会之有。揆诸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及料也。呜呼,黑幕何辜,遭此荼毒。虽曰黑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而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假借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爰特将本报黑幕一栏即日取消,暂以短篇小说为代。稍缓当别创一种记载以答爱读本报黑幕诸君殷殷盛意。至于定报赠品,仍赠黑幕乙编全部。特此通告。”<sup>[5]</sup>好一句“黑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就能把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了么?不过,毕竟这是时事新报社与黑幕文化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切割动作。

于此同时,《学灯》的版面在1918年11月12日扩大到了六分之五个版面,在25日,又扩大到了一个整版。版面扩大的同时,学灯的出版周期也从每周一次,扩大到每周三次。到了1918年12月9日,开始每天都有《学灯》面世<sup>[6]</sup>。《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说的,“起初每周一次,5月起每周二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2月起逐日刊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11月24日开始,《学灯》就在每周一三五出版了,每周三次。在1918年12月9日开始,学灯就改为日刊了。《学灯》从周刊变成三日刊,用了两个月的时间(3月到5月),从三日刊变到两日刊,用了六个月的时间(5月

[1][2]引自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54页,第88页。

[3]此处赖光临描述有误,《青光》迟至1921年11月4日才出刊。

[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第70页。

[5]《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1月9日。

[6]1918年12月15日,在《本报特别通告》中,表示《学灯》要在每周日停刊,改出《泼克》画刊。

到11月),而从两日刊到日刊,则只用了15天!是什么原因推动学术性副刊《学灯》如此快速发展呢?

《学灯》成立的时候,正是安福俱乐部成立的时候。徐树铮操纵新国会选举,尤其注意排斥研究系,“研究系之忠实分子而曾出任旧国会议员者,则另开一单,密令各省区特别注意,不许选出。”<sup>[1]</sup>虽然研究系在1918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铩羽而归,但梁启超再一次尝到了先被利用后被抛弃的苦痛。这次国会选举的失利对梁启超和研究系的打击是致命的,也让他们真正灰心于政治。梁启超在1918年10月26日回答《申报》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指出:“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sup>[2]</sup>就在梁启超准备在文化方面有所积极的时候,1918年11月,欧战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及其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潜在的冲击和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即将赴欧远行的梁启超与研究系骨干商定了今后在文化、思想界努力的方向,“是晚(1918年12月27日,作者注)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sup>[3]</sup>在这种“换一个新生命”的憧憬下,1919年2月4日,也就是《时事新报》春节停刊后再次出版的第一天,在头版头条里出现了一则重要的启事,“本报学灯栏大扩充”,其中表示:“兹将本栏扩充为两页。其理由有二。一曰小说琐闻。其目的在有趣。孰意每日阅之。其趣因熟见而不鲜矣。不如不常见之为愈也。故决定移置每星期日之泼克增刊中。二曰教育新闻。向在要闻栏揭载。非特有时被挤。而且地位有限。不能详尽。不如移置于学灯。可以自由披露。以此二理由。则学灯不能不扩充也。”<sup>[4]</sup>就在《学灯》表示要大力扩充的时候,当日的《报余丛载》竟然没有了!它已经被《时事新报》彻底裁撤了。

1919年2月5日,这一天在《学灯》的历史上是极其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这天《时事新报》的头版头条并列着两则启事,其一是昨天的用特大号黑体标题刊印的“本报学灯栏大扩充”的启事,其二是相形之下落寞很多的“钱生可启事”,作为首创黑幕之《时事新报》老牌副刊《报余丛载》的主编,钱生可在启事中说道:“鄙人现已离去时事新报馆特白:再者如有亲朋惠赐函件暂时仍请寄时事新报馆转交可也。”钱生可的语言虽简单平静,但不难想见曾炙手可热并领一时风骚的钱生可之感伤与无奈。

通过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上海报纸出版界文化生态的描述以及对《时事新报》在这种生态中种种转变的分析可知,一方面,民初社会“去政治化”之后的舆论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条件让新闻传媒的从业者纷纷都成为了拜金思潮的急先锋,极大地损害了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现代新闻出版、文化传媒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追求;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营业化的风潮中,抑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都是报刊界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时之圣者”,研究系一派知识分子作为最早赞助北大新青年一派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力量,他们的参与本身就让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了一种复调、多样的面貌。对于1919年初研究系的文化转向,北大新青年一派也是区别对待的,对于研究系主导的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历来认报纸应为文化运动急先锋的胡适极为欢迎,认为它们是“新文学的机关报”、“中国北方自由主义观念的两个有力的中心”<sup>[5]</sup>;但胡适、傅斯年等人对号称要作北大新青年一派“诤友”的张东荪所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的文化转向,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其实这牵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囿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责任编辑:平 啸]

[1]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卷,[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中华民国62年版,第713页。

[2][3]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869页,第874页。

[4]《本报学灯栏大扩充》,《时事新报》1919年2月4日。

[5]胡适:《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3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5页。